



政府政策制定者, Andrew Leigh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 将经济学和法律培训引入公共政策写作和辩论

参与本报告的编写和委员之间的讨论改变了我的想法, 即我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我所在的国家需要做些什么, 以及我希望看到多边组织做些什么。

就个人而言, 第4.8节《最佳证据对比其他证据》(best evidence versus other things)是我最喜欢的部分。这里有很多关于如何从“其他证据”中获得更多信息的明智建议, 像我这样的民选官员会定期收到这些建议, 例如一份预印本、一位有意见的专家、一个提供建议的专家小组和一份辖区范围经验综合。几年前, 我写过一本关于随机试验的书。而现在, 在完成本报告后, 我对随机政策评估的必要性更感兴趣。试验的优势之一在于它们很容易向公民解释, 它们帮助我们解决公民对“技术官僚主义”的担忧, 在这种担忧中, 普通民众认为他们会被自己不理解的决策过程欺骗。对政府的信任不仅仅在于做出正确的决策, 而在于做出公民认为正确的决策。

评估不是只与精英有关的问题。证据是为每个人准备的。我们的报告为个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建议。如果你是正在研究有关戒烟或减肥证据的个人, 那么你应该查看证据综合, 而非单一研究。如果你是一名撰写健康相关文章的新闻工作者, 那么你可以成为Cochrane的常客, 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数千个主题相关的精炼证据。对于报道社会政策的媒体, Campbell协作网可以提供同样的服务。我们的报告建议政府在决策中更好地使用证据, 并通过严格的评估建立证据库。国际组织应更多地依赖证据, 世界银行也应该准备一份关于证据使用最佳实践的里程碑式报告。

国际组织在证据的使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采用了非常严格的方法对有关全球变暖及其后果的证据进行筛选和分级。其他全球机构在证据的使用方面系统性较差, 也较常依赖于单一的研究, 且当存在大量同行评审文献时仅引用专家意见, 或是在差别很大的环境下推断证据。这并非国际机构想要歪曲科学问题, 他们反而热衷于改进, 外部专家可以基于各个机构所公布的如何使用证据决策对报告进行评估, 从而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正如第5.5节所述, 从2007年开始, “点名羞辱”对世界卫生组织(WHO)使用证据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联合国系统的其他部门也需要效仿WHO的领导。

在慈善组织中,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高质量的评估可以创建一个良性循环: 让无效的项目逐渐减少, 有效的项目扩大规模。快速发展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要求慈善机构为其影响力提供严格的证据。例如, 据GiveWell.org估计, 对于两个一流的慈善机构(抗疟疾基金会和疟疾联盟), 其项目每增加4500美元, 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这是捐助者支持这些慈善机构的强大动力。更多来自其他慈善机构直接影响的证据可能有助于推动良性竞争和发展。

